

穿越美与不美

陈远口述史系列



大师不远 潜在民间 名人自述百年沧桑

本书作者历时八载 深度采访追踪 **珍贵史料首度面世**

当代最具**学术原创力**的第五代两岸三地文化人群体亮相

穿越美与不美

 陈远口述史系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越美与不美 / 陈远撰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1.2
ISBN 978-7-229-03708-6

I. ①穿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文化—名人—访问记—中国
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10961 号

穿越美与不美

CHUAN YUE MEI YU BU MEI

陈远 撰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 华章同人

执行策划: 王 水

责任编辑: 王 水 徐 虹

特约编辑: 黄卫平

封面设计: 木鱼书籍设计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65584936

E-mail: haiwaibu007@163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20.25 字数: 298 千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谨以此书纪念一段难忘的岁月，在那段岁月里我曾经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快乐地并肩战斗。

目录

自序 / 001

- 李泽厚：穿越美与不美 / 003
- 许倬云：平生所学 未负师友 / 012
- 巫宁坤：与菲茨杰拉德有缘 / 019
- 陈之藩：半个民国人 / 026
- 倪 匡：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 / 034
- 蔡 澜：邵逸夫先生教我做就做到最好 / 055
- 秦 晖：与黑暗擦肩而过 / 063
- 何怀宏：在现代提问的传统读书人 / 073
- 陈子善：大好年华都编书 / 081
- 陈徒手：打捞旧人记忆 / 091
- 陈 来：承接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传统 / 100
- 葛兆光：我和我们时代的思想史 / 108
- 蒋 寅：三考南大，终入程门 / 116
- 杨奎松：半路出家 / 125
- 李 强：在四中闹革命 / 136
- 赵汀阳：我是机器人 / 146
- 沈志华：从民间到体制 / 156
- 朱学勤：差点被偷走的前程 / 169
- 周桂钿：在工厂里讨论辩证法 / 178
- 徐城北：新时期的旧文人 / 187
- 刘 兵：为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战 / 196
- 李伯重：旧学家庭里成长的经济学家 / 204

莫砺锋：遇到程千帆先生是缘分 / 213
邵 建：喝“狼奶”长大 / 222
王邦维：遇见季羨林先生是人生机缘 / 229
杨 义：迟到的博士帽 / 237
朱 正：《1957年的夏季》的曲折 / 245
温铁军：关键的两个“11年” / 253
李 零：在广阔天地读野书 / 262
谢 泳：我在学院之外 / 270
王学泰：牢狱之灾 有如传奇 / 279
丁 东：民间思想的打捞者 / 288
陈平原：与王瑶先生一起“水深火热” / 297
李银河：走上性学之路 / 304
梁治平：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/ 311

自序

在做民国文化名人之后口述史时，我的着眼点，其实是中国百年文化生态史，自然而然，那个系列做完一个阶段之后，我开始着意于当代文化人的生态。

早在2002年的时候，曾经和几位师友同赴太原，拜访谢泳等诸位学者，在太原我发现，高增德、谢泳、智效民等诸位前辈学人已经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研究群体，他们有着大体相同的研究方向，不定期地会聚在一起彼此交流学问。尽管，这种“学术共同体”并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，但是在客观上已经形成，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形成，对于学者的成长无疑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。

后来我开始做当代学术中坚系列时，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。

本世纪刚刚过去十年，上个世纪的百年文化史是个热门的话题，百年学人的代际划分就是从这个热门话题中衍生出来的，李泽厚先生、许纪霖先生都曾经提出过。

在这一问题上，我遵循老师谢志浩先生的说法，把百年学人划分为五代：

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章太炎、王国维为第一代的代表，胡适、顾颉刚、金岳霖、冯友兰、陈寅恪为第二代之中坚，钱钟书、费孝通、季羨林、金克木为第三代之重镇，王元化、李泽厚为第四代之领袖，朱学勤、葛剑雄、杨义、陈来、秦晖、汪丁丁、梁治平……构成第五代之群像。

在当年《新京报》的报道中，我如是写到：在刚刚结束的“名人之

后”系列中，主要侧重于百年学术的前三代学人，在即将拉开序幕的“学术中坚”系列中，将着重挖掘第五代学人（兼顾第四代）的掌故趣闻。

之前，谢志浩先生曾经梳理过一个当代学术地图的名单，此时，我在谢先生的基础上略作调整后开始按图索骥。

对于我来说，进行这项工作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谓拓荒，因为在当时，第五代学人很少有人会在文章中写过自己的经历，也少有文献可以提供线索。

后来的寻访印证了我的判断，那些前辈学人更愿意跟我谈论学术，而不是个人经历。葛兆光先生就曾经诘问我：你做学术访谈，怎么总问些各时期的个人经历？

其实对我来说，我当然更希望和这些前辈学人在学问上请益。事后回顾起来，我个人在学术上的成长，正是在这一时期和前辈学人谈论学术的过程中得到了迅速的积累。但是因为这一系列的设计初衷和文章凡例所限，我又不得不在他们的经历上穷追猛打。

转益多师，对于我这样一个既非出身名校，又非科班训练的人来说，是这一阶段的意外收获。2001年底的全国作代会，我踟蹰在杨义先生的房间门前久久不敢敲门，因为感觉自己的积累无法与杨先生对话。但是到了2005年，我已经敢于坐在杨先生面前边抽烟边向杨先生请教学问了。

每每回想起那段时光，竟然会快乐地笑出声来。

尤其要感谢李泽厚先生和许倬云先生，两位前辈不仅在学术上多有提携，在生活上也有诸多指导。

感谢我过去的搭档郭延冰，书中的很多精彩照片出自他的快门。如今，他已经是京城最著名的摄影记者了。照片没有一一署名，不过读者仅凭精彩程度上来判断，就可以认出哪些是延冰拍的。

历史真是意味深长，在史学大家钱穆的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一书中，康有为是三百年学术的终结式人物，但是到了20世纪，同样一个康有为又成了百年学术的开端。百年学术史，正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，生生不息。



李泽厚：穿越美与不美

李泽厚，著名哲学家，湖南长沙人，生于1930年6月，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，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巴黎国际哲学学院院士、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。

李泽厚成名于20世纪50年代，以重实践、尚“人化”的“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”的美学观卓然成家。80年代，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领域，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路径上艰辛前行。90年代，李泽厚客居美国，出版了《论语今读》、《世纪新梦》等著作，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了沉甸甸的人文关怀。

1

我在北大读书是在1950年到1954年，标准的四年。那四年，学校里运动不断。如果用现在的学分和学时制的标准来考查，我根本没法毕业，因为根本没上过几年课。我入学之后先是抗美援朝，后来“三反”“五反”，接着又是思想改造。我算了一下，我在哲学系基本上没有上课。思想改造的时候，老师们也不被允许讲课，比如说冯友兰等老师都不能讲课。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好，得了肺结核。1950年的时候，学校对于肺结核的学生还是蛮照顾的，进行身体化验之后，把肺结核的同学分到一起住，有自己的食堂。

后来病治好了，我就自己跑到图书馆看书，从那时候起积累了一些原始资料。所以可以说我的研究工作开始得比较早，大学一二年级就开始了。我的性格比较内向，既不喜欢和人交流，也不喜欢向人请教，所以走了不少弯路。

我的大学生生活过得很平淡，也很困苦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，在同学当中算是最穷的，而且还要负担一个上学的妹妹的学费。当时北大还有很多老先生在，但是我跟他们联系很少。我记得我曾经给冯友兰先生写过一封信，他在回信中很称赞我。但是一方面他们都在“学习”，在运动中作“运动员”；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欢交往。倒是我在毕业之后跟冯友兰先生联系比较多。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发表文章了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发表文章的时候25岁。不过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思想上的独立意识已经比较强了，对于那些老先生，既没有盲目的崇拜，也没有盲目的批判。那些老先生当时都是所谓的“旧知识分子”，崇拜的不多，批判的倒是不少。

我常常说我的经历非常简单，如果填表的话，两行就够了：1950年到1954年，在北京大学学习；1955年之后一直到现在，在中国社科院（当时还叫科学院）哲学所工作。

我刚到哲学所的时候，哲学所还在中关村，离北大很近，我偶尔到北大冯友兰先生那里去看他。当时我稿费很多，买了一台电动的唱片机，但是唱片很不容易找，我从冯先生那里借了很多唱片。后来“文革”开始，冯先生在学校里受到批判，哲学所已经从中关村搬到了城里，我和冯先生来往就少了，尽管中间也曾经去看过他几次。后来八十年代的时候冯先生给我写了一幅条幅，让宗璞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拿。不久之后冯先生就去世了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。

我在“美学大讨论”之前已经成名。当时发表文章不像现在这么容易，“美学大讨论”之前我就发表了几篇文章。第一篇发表于1955年4月，内容是关于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，跟美学无关。一些老教授看了我的文章，都很吃惊，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。我现在看我50年前的文章，还感觉很欣慰，因为不管是内容，还是论断，还都是对的。我觉得学问上的事情，最重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一本书、一篇文章，轰动一时不算什么，如果过了二十年、五十年还有人看，还有人买，那才是值得高兴的事。开展“美学大讨论”的时候，我刚刚毕业。朱光潜发表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《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》，后来周扬提出美学思想可以自由讨论，紧接着蔡仪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朱光潜，黄药眠也发表了文章。我很早就对美学比较感兴趣，所以也写了一篇，文章中一方面批评了朱光潜，另一方面也批评了蔡仪。朱光潜的文章大概是1956年下半年发表在《文艺报》上，我的文章是在1957年1月的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的。当时正在提倡百家争鸣，所以美学讨论在当时非常热闹。之前我还曾经在

《光明日报》的《文学遗产》副刊上发表过其他方面的文章。当时国内能够发表学术文章的杂志只有《文史哲》和《新建设》，报纸则只有《人民日报》和《光明日报》，这种情况是现在无法想象的。

3

我关于美学讨论的文章发表不到半年，“反右”运动就开始了。不过我比较幸运，“反右”还没有开始，我就离开北京跟我们所里一些人到敦煌去考察壁画去了。当时敦煌的洞窟可以随便进，还不像现在管理得这么严格。当时常书鸿就在那里，不过我们没有什么接触。我的个性是不大跟人接触，尤其不会主动和人去接触，别人来找我，我也不会拒绝，但是我从来不主动去找别人，包括钱学森来看过我，我却从来没有去看过他。我从敦煌回到北京的时候，“反右”的高潮已经过去了。所里倒是也曾经调查我，问我在路上说过什么话。不过当时所里的右派比例已经超过了一般单位的右派比例，所以有人说我成了一个“漏网右派”，像当时我们所的贺麟，也是“漏网”的。

1957年12月，我和所里几十个人被下放到太行山区的元氏县去劳动，这些人大多数是右派。当时我在所里还算是业务尖子，本来可以不去的，但是因为我是“漏网右派”，所以也要下去改造思想。在那里主要就是劳动，连洗衣服的时间都紧张。而且又赶上1958年大跃进，整天都在干活儿。当时我记得经常搞“夜战”，“夜战”的时候，两三点钟就要起来，带上一张油布，那时没有塑料布。走到地里，把油布铺在地上睡觉，睡到天亮的时候起来干活，现在想起来很可笑。当时是讲“三同”，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我们所里的人分成几拨，住在老乡的家里，吃“派饭”，今天在这个老乡家吃，明天到那个老乡家里去吃。当时我正当年，肩上要担一百多斤的担子，所以每天都觉得很累。过年的时候，有家的人可以回北京过年，而我们那些单身汉则不让回来，虽然元氏离北京很近，但是就不能回来。

这次下放回来，紧接着又是下放。这次是在1960年，到山东。如果说第一次下放最深的印象是“累”，那么这一次就是“饿”了。每天只能吃到四个白薯，没有别的东西吃，饿得很厉害，全身都开始浮肿。当时老乡还有自留地，我们则是什么都没有。

我的生命中还有两次“四清”。“四清”和下放不同，下放主要是劳动，下放的人在别人看来都是犯了错误的，劳动是对你错误的惩罚。“四清”则不一样，下去“四清”的算是干部，下去清查地方干部的“四不清”。前后两次“四清”，大概也是两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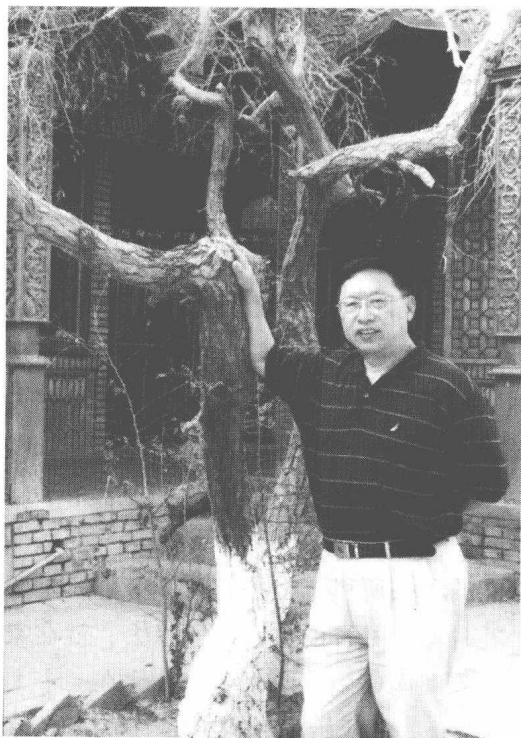
4

“文革”开始的时候，我在北京。当时有些人很狂热地卷了进去，我算是个“逍遥派”，看法虽然也有一些，但是没介入那些纷争。不过机关跟学校有很大不同，因为都是成年人，所以不像学校闹得那么厉害，虽然两派之间争得也很厉害。我们所里当时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操纵整个北京市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因为哲学所造反派的头儿和中央文革小组有直接联系，别的地方的造反派都是年轻人，我们所里的则都是老革命，跟康生有直接联系。我们所所谓的造反派其实也不过是跟中央文革小组有联系而已，在别的单位基本上算不上是真正的造反派，所以也引起了真正造反派的不满，就来造他们的反。当时很多人被揪斗了出来，像张闻天、何其芳等人。

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，就尽可能的不去所里。但是有时候有事还是要去一次，平时就开个病假条，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也不到所里去，就在家看看书。1970年，我们所集体下放到河南信阳，两百多个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，这就是“五七干校”的生活了。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住在老乡家里，土房子，没有窗子，白天都是黑的，下雨的时候到处都是泥。白天到很远的荒地去干活，这样干了几个月，就开始自己盖房子，自己做坯、烧

砖。但是也没有多久，又搬到了别的地方，就是我才说的那个两百个人住在一起的大房子。我们之中年纪大的有六十多岁的，年纪轻的有十七八岁的，晚上打起呼噜来此呼彼应。那时候，我们每天的主要活动还是劳动，不过劳动之外多了开会，还要抓“五·一六”分子。

不过在那里，也还有一些学习的机会，因为总不能时时刻刻地开会搞运动，所以每天还有一段自学时间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把讲马克思理论的书摆在上面，在底下则偷偷地看康德。当时去干校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统一的箱子，可以放衣服什么的，我则把我最喜欢的和自己觉得最值得读的书放到箱子里带到了那里。跟1958年的“四清”比起来，干校的生活似乎没有那么饥饿，伙食相对也要好一些，不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在农



民家中和农民同吃的时候，苍蝇经常跑到用白薯做的面条里面。后来开始自己吃饭了，总算是有了一些改善。那时候，我开始着手准备那本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。当时材料有限，看到的材料更加有限，所以一直没有动笔，因为如果不看哲学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，一个人在那里想半天想出来的东西，结果是人家早想出来的成果，就算是白费了。1972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，接着研究康德，别人也偷偷摸摸地帮我借一些书。

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5年，又一次下乡运动来了，但是我这次并没有去，因为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了，整个政策都发生了转

变。从七十年代转变到八十年代，客观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5

有人把我归结为八十年代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，其实我写文章，并不太考虑读者的看法，到现在也是如此。当时我在所里从来不讲我研究的这些东西，也从来不去申报什么课题。后来书出版之后，所里的人都吃了一惊。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当时卖了三万册，算是美学界卖得最好的书。当时还没有“炒作”这个词，买书的人到现在也有四五十岁了。当时很多人称呼我“导师”、“精神领袖”，因为从小就听到过很多过奖之辞，所以对于这些，我没有什么飘飘然的感觉。我在所里的待遇也并没有因为这些带来什么好处，直到1986年，我在所里才分上房子。相反，我觉得有很多人开始攻击我，包括我们所里的一些人。对于这些我倒也能够习惯。

62岁的时候，我到了美国，主要是在大学里教书。我常常说到美国有三大冒险：第一个冒险是62岁还要去学开车，很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学，但是我说我没有办法啊，在美国那种环境里，不学开车我没办法走路啊。学车我用了比别人多一半的时间，还算是学会了。第二个冒险就是我必须要学会讲课，我毕业之后就分到社科院了，从来没有上过课，到了大学里必须要登台讲课。第三个冒险就是必须用英文讲课。没有办法，我硬着头皮去讲了。这三大冒险我总算都闯了过去。想起来不容易呢，毕竟当时我60多岁了。

侧记

去见李泽厚之前，我心里一直嘀咕：他现在是什么样子？曾经他的影响之大，无出其右者，也曾经沉寂多年，后来因为一本《浮生论学》和《告别革

命》而备受争议。关于他的段子还有一个，是在他沉寂多年之后的：话说是在某一年，李泽厚南下应邀作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。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，对此并未大事张扬，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，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。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：太好了！李泽楷要来了！

果然，一见到他，李泽厚就说：“你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大概不知道我了。”神情中有几分落寞。李泽厚是个不善言谈的人，我问，他答，很长时间里，我和他处于一种有点尴尬的境地。后来采访结束了，我们在一起闲聊，对诸多问题的看法，聊了很多。碰巧，我的好多看法跟老爷子出国以后在外面发表的文章观点很相近，以至于他总是问我：我某年发表的某一篇文章，你看过没有？我摇头。他一下子来了兴致，“你等一下，我送你一本书。不知道你看没有。”

短短时间内认识一个人是困难的事情，但是我还是想试着为李泽厚画个像：他外表不修边幅，显得有些木讷，内心却很自负。这种自负，是建立在对自已所说的话、所写的文章“负责任”的基础上。单单凭这一点，就让我对李泽厚保持了自始至终的敬意，观点是否相同，反倒退而其次了。

补记

有同事想采访李泽厚老师，问我李老师的联系方式。我知道李老师很久以来都谢绝媒体采访，所以打电话给李老师征求他的意见。

电话一般都是李师母接，接通后，师母说：“你打来的真巧，他刚从外地回来，下飞机不到两个小时。”我赶忙说：“那让李老师休息？”电话里听到李老师说：“不用。”

像往常一样，“你那边几点？”“下午6点左右，你们那里正好是早晨。”

“要不要休息一下？”

“不用。”

“去外地（哈哈，电话是昨天打的，我记不住美国的州名，只好用外地代之）做什么？”

“我最近写了一个文章，他们那边邀请我去做一下研讨。”

“现在还经常写文章？”

“很少写了。”

把话题引上采访的事情：“我们有个同事想采访你，行不行？”

“你知道我是不喜欢采访的，谈来谈去都是老问题，我不喜欢重复。”

我当然知道，去年做《论语》专题，我软磨硬泡两三天，李老师碍不过，才勉强答应。可是一开篇就是：“我不想谈。”

“就当和年轻人聊聊天嘛！”我不放弃。

李老师笑：“你这是‘为人谋而不忠乎’啊，可是有什么好谈的呢？最近一个报纸要采访我，我也拒绝了，可是他们事先在报纸上登出了采访我的预告，我只好答应他们可以用我以前的采访，也有你的，不知道他们登了没有？最好是没有。”

最近有了女儿，很少留心其他的报纸，只好老老实实地说：“我没有留心。”

然后闲聊，不知怎么从西方的汉学界谈到了余英时先生的电话：“前一段时间余英时打电话来说×××要退休了，接任的是个洋人。”

“你们经常通电话？”我想当然。

“也不经常，你知道我从来不主动给人联系，余英时一年大概会打一两次电话给我，跟你差不多啦，你也很久没有给我来电话。”

我赶紧“辩解”：“我比余先生要频繁一些啊，上次给你打完电话后，第二天女儿就出生了，现在女儿还不到四个月。”

“那要恭喜你，为人父了，会有不同的感受。”

后来话题又一转，说到了李老师的两本新书，虽然都是旧文章的再结集，但是都有新的文章加入。我最近去书店少，都没有留心。赶紧问哪里有，去找来看。“你去找来看也好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收线，去书店寻书去也。

（补记于2008年6月12日）